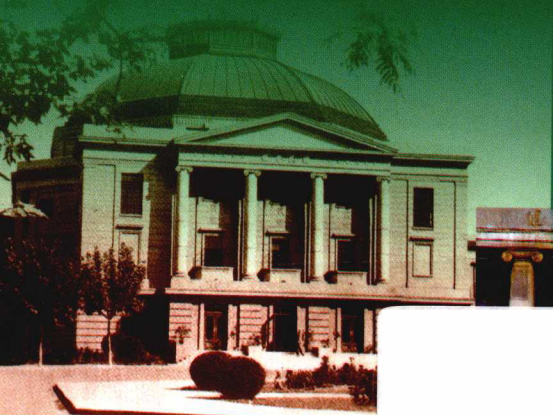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

大学区制度变迁研究

■ 赵峻岩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

大学区制度变迁研究

■ 赵峻岩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大学区制度变迁研究 / 赵峻岩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305 - 10700 - 9

I. ①民… II. ①赵… III. ①高等—教育制度—
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G64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164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出 版 人 金鑫荣

邮 编 210093

书 名 民国时期大学区制度变迁研究
著 者 赵峻岩
责任编辑 姜 晨 王抗战

编辑热线 025 - 83596997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印 刷 宜兴市盛世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20 字数 340 千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0700 - 9
定 价 40.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民国时期大学区制度变迁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A880166）的主体成果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研究成果

序

民国时期的大学区制，是一项出于美好愿望的教育体制改革，可惜只进行了短短两年，就以失败告终，来去匆匆，短命得很。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某个历史节点上的重要事件，当螺旋到后世某个似曾相识的节点时，常常会应时顺势地浮出水面，并且会有恒提恒新的效果；尤其是那些以失败告终的历史事件，唯其失败，往往包含了更深刻的历史教训，更能给后人以启迪。民国大学区制，应该属于这样的历史事件。

赵峻岩博士的新著《民国大学区制度变迁研究》，是研究民国大学区制的一项新成果，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本书在收集整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论述了民国大学区制的历史背景和设计思想，剖析了中央、浙江、北平三个大学区的组织特征和运作机制，揭示了大学区制在运行过程中的矛盾及其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教训。本书资料翔实，分析细致，其中关于蔡元培与李石曾各自作用的辨析，关于各大学区特殊矛盾的揭示，都富有新意，为我们全面了解民国大学区制的实际进程绘制了一幅清晰的图像，也为我们深入探讨其成败得失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民国大学区制，就其对旧体制的革新来看，的确算得上是一副“猛药”。但是，这副“猛药”是否对症，大有疑问。蔡元培等人推行大学区制，主要目的是“教育独立”。蔡元培对北洋政府摧残教育的恶行，有着切肤之痛，所以他说得很决绝：“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国民政府甫定南京，蔡元培遂与一直推崇法国大学区制的李石曾联手，来给民国教育炮制这副“猛药”。在蔡元培看来，只要建立起不隶属于政府系列的大学区，并由作为教育家的大学校长统管全区教育，那么就可以将教育从“体制内”剥离出来，实现教育行政“学术化”，从而实现教育的独立。但是，借用法国大学区制以求“教育独立”，本身就很矛盾，因为法国的大学区制，并不是按照“教育独立”的精神设计的，它恰恰是拿破仑推行中央集权制的产物，是把教育捆绑在“体制内”的结果。当然，民国大学区制并非一定要如“法”炮制，也并非就一定不能追求“教育独立”而富有“中国特色”。事实上，蔡、李这些高人就是按照“民国特色”设计大学区制的，大学区制推行之初也颇

有“体制外”运行的几分样子。不幸的是,这些都是表面的、暂时的现象。民国的这些高人们,显然忽视了“教育独立”的社会条件,忽视了当时“以党治国”的体制背景,低估了“体制”的威力。当社会条件没有具备、体制本身冥顽不灵的时候,强行把教育拽到“体制”外去运行,貌似“教育独立”,实则“为体制”以“潜规则”干预教育留下了更大的空间,从而造成教育对“体制”的另一种依附,而且是一种更变态、更有害的依附。蔡元培等人看准了症结,却开错了药方,大学区制的失败几乎先天就命定了。

应该说,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愿望是真诚的(尽管也很天真),他们真心不愿看到新政权“重蹈北京教育部以官僚支配教育之覆辙”,而且他们的“顶层设计”也很认真、严肃。但是,大学区制的推行,却很仓促。蔡、李等人的“顶层设计”,基本是“纲要”性质的,缺少更具体的实施方案,因此改革的具体实施,实际上是由各大学区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到了学区层面上,情况就复杂得多了。首先是各大学区的相关主事者们对这场改革的认识不可能都像蔡、李那样到位,他们的动机、目的更是大相径庭,其中甚至不乏以改革之名以售其奸者,于是乎,实际推行中的偏离方向、南辕北辙,就不可避免了。其次,因改革本身而出现的矛盾和纠纷,如学校的分合、校名的更变、经费的分配等,改革设计者显然缺少应有的估计,也没有应对的预案。矛盾和纠纷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和缓到激化,最终几乎完全失控,不可收拾,这显然是蔡元培等人所没有预料到的。因此,1928年8月,当有人动议再建北平大学区时,蔡元培自己竟成为最主要的反对者,这实在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再者,推行大学区制,目的之一是教育行政“学术化”,也可以说是“去行政化”。但是,大学区制的实际推行,很大程度上却是以行政化的方式进行的。以行政化的方式推行“去行政化”的改革,不是一定不能成功,而是先要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那就是“行政”一方具备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壮士断腕的勇气。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那么以行政化的方式推行“去行政化”的改革,势必流于形式、虚张声势,甚至形左实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从而造成新的甚至更严重的行政化。民国大学区制的失败结局,应该是很能证明这一点的。

民国大学区制,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前车之鉴,后人能够从中吸取多少教训呢?

周 川

2013年7月23日

目 录

绪 论	1
一、问题提出	1
二、大学区制学术史	5
三、理论基础与方法	15
四、体系结构与特点	20
第一章 大学区制试行的背景分析	24
第一节 制度演变背景:近代中国教育行政制度的沿革	24
一、中央教育行政制度的演变	24
二、省教育行政制度的演变	27
三、县教育行政制度的演变	28
第二节 制度来源背景:法国教育制度的原型	29
一、法国中央集权教育制度的形成	30
二、法国教育行政制度的构成	35
第三节 制度理念背景:教育独立思潮的影响	41
第四节 制度社会背景:思想政治财政的紊乱	48
一、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荡	48
二、各方势力之间的博弈政治	51
三、财政混乱的窘境	53
第五节 制度推动者的背景:李石曾法国大学区制情结	56
一、李石曾的思想流派	56
二、李石曾大学区制教育思想与实践	59
三、李石曾与蔡元培教育理念的渊源	65
第二章 大学区制的设计及其组织法的修正	70
第一节 大学区制试行时中央教育行政制度变革	71
一、大学院的制度设立	72

二、大学院组织法及其制度调整	75
三、大学院的制度取消	87
四、大学院审议制度的运行	96
第二节 大学区制的建立及制度调整	106
一、大学区制设计的过程	106
二、大学区组织条例的制度调整	111
第三章 中央大学区的组织设置及运行问题	117
第一节 中央大学区的试行与组织构架	117
一、第四中山大学区的筹建过程	117
二、中央大学区组织与人事	119
第二节 中央大学区试行中与大学院的冲突	138
一、改名风潮	138
二、大学易长风波	144
第三节 中央大学区试行中与特别市的矛盾	155
一、特别市教育权限之争	155
二、特别市屠宰税之争	161
第四节 中央大学区试行中教育经费的纠葛	164
一、试行大学区制前教育经费分配原则	164
二、苏省中校旧欠	165
三、卷烟特税调整后之困境	167
四、经费预算比例之纠纷	173
第四章 浙江大学区的组织设置与设施建设	178
第一节 浙江大学区的组织与人事	178
第二节 浙江大学区的教育设施建设	184
一、浙江大学的筹建	184
二、省立中学的改组	186
三、小学教育的推广	187
四、视导制度的弱化	188

第五章 北平大学区的组织设置与护校风潮·····	190
第一节 北平大学区的组织与人事·····	194
一、大学委员会北平分会·····	195
二、北平大学区教育行政院·····	196
三、北平大学区大学本部·····	201
第二节 北平大学区高校的护校运动·····	203
一、北洋大学护校运动·····	203
二、北京大学护校运动·····	204
三、女大、师大护校运动·····	209
第三节 北平大学区试行过程中的派系纠葛·····	211
第六章 大学区制的取消·····	220
第一节 中央大学区的取消·····	221
一、江苏地方教育团体与地方党部的反对·····	221
二、中校易长风潮·····	237
三、中央大学维护学校经费运动·····	247
第二节 浙江大学区的取消·····	259
第三节 北平大学区的取消·····	261
一、北平大学区高校学生的反对·····	261
二、河北中等教育界的反对·····	263
三、河北地方党部的反对·····	264
第七章 大学区制废止原因的分析·····	270
一、大学区制的制度理念与中央训政精神冲突·····	271
二、经费困难无力承担大学区制的制度成本·····	276
三、制度路径依赖阻止大学区制的制度进路·····	280
四、利益集团的倾轧催化大学区制的制度失效·····	283
五、大学区制正向意义的思考·····	287
主要引征史料和参考文献·····	293
后 记·····	305

绪 论

一、问题提出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今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虽然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产生最早而且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却并不是古代高等教育的自然延伸和发展,而是在西学东渐潮流的冲击下,中国近代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属于比较典型的“后发外生型”,即起步较晚,且由外来因素所诱发。因此,对西方教育制度的借鉴、模仿、融合所导致地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就成了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总体上来说,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路径转换,是由取向日本到借鉴德国和美国,继而移植法国到最后又回到模仿美国的过程。

民国大学区制就是以法国模式为原型的教育行政制度。对于大学区制的困惑缘起于“三民主义时代中,一件最巨大的变动,即大学院大学区制之试行。它虽然忽来忽去,有如昙花一现,而中国的教育经此变动之后,却从此少有变革,进入了安定成长的时期。故大学院制便成为一个自变革入安定的明显的分水岭”。^①可见,从教育行政制度发展上来看,大学区制在教育行政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教育行政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大学区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行政管理制度?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受到“中国最大的教育家”(冯友兰语)的青睐?^②对此,有论者也认为,大学区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恐怕言人人殊,即便是作为前贤的蔡元培、李石曾,在这一问题上恐怕也难称专家。当历史的大幕已然落定,前贤的事功飘逝如尘,我们在追索来路时,不可不静心细思:其中是否有奥义存焉?^③

① 陈哲三著.《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前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12月初版,第1页。

② 高伟强等编著.《民国著名大学校长,1912—1949》,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页。冯友兰说蔡元培是“中国‘最大的教育家’”,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与实践者”。

③ 叶隽著.《在历史视域中追索法国教育制度》,《中国教育报》,2008年6月19日第8版。

就教育管理体制而言,大学区制不是忽发奇想,而是其来有自。民国初年始,即有划分大学区的提议。1914年5月,袁世凯政府制定《教育纲要》,当时教育部就制定出《划分大学区案》,拟分全国为四个大学区。^① 汤化龙出任长教育部后,大学区增至六个:(1)北京,(2)南京,(3)广州,(4)济南,(5)成都,(6)福州。1916年7月,范源濂任教育总长时,又分全国为七大学区。^② 只是此类分区仅限于筹议,远未全面实施。此后,1922年间,蔡元培、胡适等也曾议及“第一大学区(北京)国立各校合并”事宜^③。因而,“民国初年的大学及高师的分区设置为大学区制奠定了基础,大学区制不过是分区设置的继续。”^④ 大学区制不仅具有本土色彩的遗传基因,它更是秉承法国教育行政体制的血脉,并且法国至今一直沿用大学区制这种教育行政体制。^⑤ 由此可知,试行大学区制亦非毫无基础。从1912年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期间,动议实行大学区制,到1927年6月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大力推行,得以正式实施,可以说是经过历时不短的和酝酿,其生产的准备过程不可谓不长,但仅仅经过了两年时间,就因为种种的原因和发生的混乱而被迫取消,以废止而告终,其流产过程不可谓不短。“伟大的人物基于共同的理想而联手合力进行一种制度性的文化移植,最后却种出了糟糕的果实,这种经验怎能不

① 《划分大学区议案》(民国元年七月十八日),黄远庸著,《远生遗著》民国丛书第二编(99)综合类,上海书店(没标出版日期,根据中国科学公司1938年版影印),第182-184页。此案将“我国大学约可分四区。第一区包括京师、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及东三省,而以京师或天津为大学本部。内外蒙古暂归第一区,日后教育发达,再行区分。第二区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江西诸省,而以江南之南京为大学本部。第三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而以广东之省城为大学本部。第四区包括湖北、湖南、四川陕西、甘肃。而以湖北之武昌或汉口为大学本部,新疆西藏暂归第四区,日后再行分区。”陈哲三认为此案“是法国大学区制的办法,这个议案是大学区制在中国计划实行的第一次。”参见氏著《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12月初版,第6页。金以林也认为“是仿效法国大学区制的模式而制定的。然而由于当时教育界多为留日派势力所控制,赞同的人很少,而未能实现。”参见氏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

② 第一区为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分科大学设在北京;第二区为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分科大学设在南京;第三区为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分科大学设在太原;第四区为湖北、湖南、四川三省,分科大学设在武昌;第五区为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分科大学设在广东;第六区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分科大学设在云南;第七区为东三省,分科大学设在奉天或吉林。见:陈青之著,《中国教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第671页。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第377页。

④ 黄启兵著,《中国高校设置变迁的制度分析》,福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64页。

⑤ 法国大学区制也随着历史的进程出现流变,目前也不是完全以大学的设立为一个大学区的设立标准。故此,现在有学者已经将法国大学区改称为教育区。参见:黄昆辉著,《教育行政学》,台北:台湾东华书局有限公司,1995年5月二版,第779页。

认真总结。”^①由此产生一些问题：大学区制到底是如何试行的？什么原因导致速亡？是制度本身的问题？抑或制度环境的问题？还是有其他相互关联的因素影响？不同的大学区的实际试行情况如何？有何特殊表象？反对大学区制的理由是什么？哪些势力结构在积极操纵？

解答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做这样几个研究。

首先，需要尝试将大学区制重新建立起来，让历史重现于现实面前，一如当年的模样。台湾学者陈哲三于20世纪70年代研究民国大学院时，曾经指出：“大学区制之试行，距今不足五十年，而知之者已鲜，大学区制在民国史上所代表之地位，重要如此，而知之者尤鲜。”^②然而，“历史的遗产随时间的推移，不仅不会推动它的价值，反而会越来越稀罕。”^③因此，目前进行此项研究，正好可以满足历史的呼唤，拂去尘封的历史，还原旧日的大学区制，对于这一点自然是容易的，不仅是不同时代的境域不同，而且复制当年大学区制的实况，更取决于今天对历史文献的收集和明鉴。

其次，需要尝试解答大学区制与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教育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大学区制与当时社会环境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相互博弈。特别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上，大学区制的许多困难由此而产生，也是最后导致取消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明晰其中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讨论大学区制在运行过程中，个中的利益主体和矛盾主线，研究其在试行中的实际困难、得失情况，厘清最终造成失败的诸多因素。

第三，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一项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大多是利益关系妥协的产物。因此，围绕大学区制而展开的各方面人脉关系，特别是制度核心人物之间的背景、对此的态度和利害关系，也是我们把握当时制度变迁的重要依据。

第四，大学区制在江苏、浙江、河北三地试点运行。中央大学区作为大学区制的主要试点之一，因关系复杂，冲突叠起而屡起风潮；而北平大学区更是自始至终，风波颇多；只有浙江大学区，虽然建树不大，但运转相对平静，算是运行正常。因此，总结各大学区实施的具体情况，比较试行中存在的不同表

① 叶隽著，《异文化的博弈：中国现代留欧学人与西学东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400页。

② 陈哲三著，《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自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12月初版，第2页。

③ 周川、黄旭主编，《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再版前言），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页。

现,以分析大学区制的制度本身的适用性,从而厘清这一制度存废的具体原委。

最后,通过研究,试图思考大学区制带给我们的启示。“大凡制度的变迁,总是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扬弃与革新。”^①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因此,我们不禁要拷问:大学区制取消的原因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仅先天不足而且还水土不服,但从教育体制发展的基础来看,是不是还有更深刻的制度原因?由于大学区制历时太短,有无可能,其制度的良性特点还没有发挥出来?或其有利于教育发展的正面效用,也随着制度的人为终结而一并消失了?大学区制对随后的教育发展是否有正向性的影响和促进?

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已有的成果还没有能达到这个要求。因此,本书试图从上述几个方面,通过挖掘史料,建立历史镜像,还原大学区制的真实面貌,不仅点亮历史,还要关照现实的教育发展。诚如哈罗德·珀金(Harold J. Perkin)所言,“虽然研究高等教育的历史学家手中没有水晶球可作预言,没有魔镜可供占卜,但他在这一领域也能为他人提供有益的东西:如果你想要知道你要去哪儿,它帮助你了解你曾去过哪儿。”^③同样,对于民国时期大学区制的解读,可能是多维度的。正如德鲁克所说的:“现在我们知道,重大历史事件极少只有一个原因和一种解释。历史事件一般是许许多多不同的和独立的发展汇合的结果。”^④所以,大学区制作为中国近代以来教育行政制度的一件重大事件,不仅关涉到教育,还关涉到政治、历史、文化等多个方面。因此对民国大学区制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对教育学会有所贡献,而且也为历史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资料。又如有人说:“老的材料只有用新的眼光去看,才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⑤所以本书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分析工具,来剖析和归纳民国时期大学区制存废的前因后果,从方法上对高等教育研究创新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① 田正平、商丽浩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页。
 ③ [美]伯顿·克拉克编著,王承绪、徐辉等译,《高等教育学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12月第2版,第49页。
 ④ 彼得·德鲁克著,张星岩译,《后资本主义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⑤ 黄启兵著,《中国高校设置变迁的制度分析》,福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页。

20 世纪 20 年代末大学区制度的试行,是近代教育行政制度的一次改革尝试,在中国近代教育行政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对民国时期教育行政管理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和意义。从历史学的角度,深入细致地剖析民国时期大学区制,有助于更加全面具体地了解中国近代教育行政制度的样态,并真实地呈现当时境域下的大学区制的全景信息,满足于历史的呼唤。因此,对大学区制产生、运行和取消原因的全面考察,不仅有利于深化对当时社会环境下大学区制的认识,也有利于认真总结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经验教训,是对中国 20 世纪借鉴和引进外国教育经验史的有益补充,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对民国大学区制历史事件梳理的同时,从高等教育学的角度总结大学区制所追求“行政学术化”和“教育家办教育”的理念,对观照当下的高等教育发展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另外,通过对大学区制研究,可以弥补此一历史事件在高等教育史上的空白,从而完善和丰富中国近代教育行政制度的全景图,焊接从学部体制下提学使司、教育厅制到大学区制,这一省级教育行政管理模式的流变过程,对近代教育行政制度史的结构完整具有学科意义。

二、大学区制学术史

自 1927 年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推行大学区制以来,此项制度一直不断受到多方面的质疑,因此当时有人对大学区制多有研究。随后各种有关近代教育史的专著和论文也对大学区制有过论述,但均只有简要的述评,未见系统的研究,显然其研究目的并不是针对大学区制。迄今为止,笔者通过查阅历史文献、超星图书馆、读秀知识库和《CNKI 中国全文期刊数据库》等研究资源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关于民国大学区制研究的文献粗略可以分为六部分:一是中国近代教育史、断代史,二是与大学(高校)发展相关的专题研究,三是学位论文,四是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五是近代教育史料汇编、校史、人物文选、日记和年谱,六是外文参考文献。下面从这六个方面来做一简单回顾:

(一) 中国教育行政史、教育制度史或教育通史类著作

1.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此类著作以商务印书馆的版本居多。这一时期出版与民国大学区制研究略有关系的著作主要有:程湘帆编《中国行政教育》,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吴研因、廖世承、何炳松等 17 人撰稿,全书分上下两卷,共 16 篇,1931 年商务印书馆为纪念创馆 35 周年出版),

姜书阁编著《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杜佐周著《教育与学校行政原理》，周予同著《中国学校制度》，周予同著《中国现代教育史》，丁致聘编《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张季信编《中国教育行政大纲》，杨鸿烈著《教育之行政学的新研究》等等。^①另外，此时期还出版了王凤喈著《中国教育史大纲》和陈青之著《中国教育史》等通史类著作。^②总的来看，虽然这一时期关于中国教育行政史、教育制度史或教育通史的研究非常丰富，但由于此期正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因而以上著作对这一时期大学区制的内容涉及不多，加上缺乏必要的审视时距，著者也难以对当时的教育行政制度宜评。因此，以上著作只能作为本书的参考材料。

2. 由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相对沉寂，加之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权性质的改变，此一阶段，中国大陆上的相关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几乎陷于停滞。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后主要的著作有：1961年重新整理舒新城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出版了《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全三册），作为教学参考资料。^③书中按照阶级斗争的观念和近代史分期法，对原书做了大里删除，取材范围相对狭小，史料价值已大为削弱。虽然此间也出版了不少教育史著作，如陈元晖著《中国现代教育史》，沈灌群著《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毛礼锐、邵鹤亭、翟菊农等著《中国古代教育史》，陈景磐著《中国近代教育史》，顾树森著《中国历代教育制度》等等，但这些著作或者只是作为教材而编写，对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行政制度涉猎不深，或者因受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而认识不够公允客观，因此对民国大学区制研究的参考价值不大。^④相比之下，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要丰富得多。主要的著作有：郑世兴著《中国现代教育史》、陈启

① 分别为：程湘帆编，《中国行政教育》，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9月初版；姜书阁编著，《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杜佐周著，《教育与学校行政原理》，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周予同著，《中国学校制度》，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周予同著，《中国现代教育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出版；丁致聘编，《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国立编译馆，1935年出版；张季信编《中国教育行政大纲》，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杨鸿烈著，《教育之行政学的新研究》，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

② 王凤喈著，《中国教育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陈青之著，《中国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

③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全三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出版。

④ 分别为：陈元晖著，《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沈灌群著，《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长沙：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毛礼锐、邵鹤亭、翟菊农等著，《中国古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陈景磐著，《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顾树森著，《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

天著《近代中国教育史》、伍振鹭著《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等等。^①其中1974年台湾正中书局出版了孙邦正的《六十年来来的中国教育》，该书共分十章，从教育宗旨与教育方针、教育行政制度、学校制度等诸方面回顾和梳理了民元以来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每章均先叙述其沿革，稗明其源流，然后就民国以来之史实，分期叙述，稗能明瞭各时期之特色，最后说明今后发展之途径，作为今后革新教育之参考”。^②虽然作者目的在于“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以此作为“革新教育之参考”，但是书中所附的图表、附录、引用的原文以及作者对民国教育所作的系统梳理，同样为民国时期大学区制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素材。1981年，台湾广文书局出版了郭为藩主编的《中华民国开国七十年之教育》。^③全书分上下两卷，由27位教育界学者执笔，分别从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研究与实验和各级各类教育之发展五个方面，勾画了中华民国和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的教育发展脉络，但该书对于1949年后台湾地区的教育着墨过多，对此前教育的叙述显得相对单薄，且文献资料不够详备。其中与国民政府时期大学区制关涉较多的，是学者雷国鼎编撰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改革》专题。

最为值得提及的是，1976年12月，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陈哲三著《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一书，该书作者“毕业后入党史会任编纂工作”，“因工作之机缘，得见当时许多重要史料”，用以撰写大学院的“试行经过，制度梗概、设施情形，并分析其得失成败之因果关系”，“由于史料的充分利用，本文也是对大学院制的首次全盘的整理检讨，还其本来面目。”^④虽然作者在研究中也对大学区制的运行情形进行了相当篇幅的梳理，但其研究旨趣主要还是在对大学院制的明察和分析，故与本书侧重点各有不同。同时，笔者也发现其对大学区论述时存在一些文献不确或误读，比如中央大学评议会成员名单，比如混淆中校联合会和中校教职员联合会两教育团体的性质等等。但整体上其资料丰富可靠，特别是引文中有许多诸如中央政治会议、全国代表大会等会议记录和私人信函，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文献，这些资料对于笔者研

① 分别为：郑世兴著，《中国现代教育史》，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陈启天著，《近代中国教育史》，台北：台湾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伍振鹭著，《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

② 孙邦正编著，《六十年来来的中国教育》，台北：台湾正中书局出版，1974年，第18页。

③ 郭为藩主编，《中华民国开国七十年之教育》，台北：广文书局出版，1981年。

④ 陈哲三著，《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12月初版，“吕序”第2页；“自序”第2页；“前言”第4页。

究之帮助是至关重要的。

3. 二十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观念变化以及有关资料的大批发掘、整理和出版,这一阶段与国民政府教育制度有关的研究进展得极为迅速。这些研究成果,多体现在教育通史以及教育管理史、教育制度史等专题史、教育行政学等著作中。

这一阶段出现了堪称鸿篇巨制的通史类著作,此方面尤以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共六卷),于述胜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为代表。^① 其他的还有诸如陈景磐的《中国近代教育史》,陶愚川的《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近代部分现代部分》,高奇的《中国现代教育史》,熊明安的《中国高等教育史》及《中华民国教育史》,余立、郑登云所著的《中国高等教育史》,李华兴的《民国教育史》,霍益萍的《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喻本伐、熊贤君的《中国教育发展史》,田正平、商丽浩的《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动作与教师流动》,曲士培的《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董宝良的《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等等。^② 上述著作对大学区制有一定论述,但这些著述均着重于宏大叙事,着重于整个教育(高等教育)场景的描述,对大学区制的研究着墨不多,多流于简单介绍,大都是一笔带过,认为大学区制“就现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也确实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③

在教育管理史著作方面,如程斯辉所著《中国近代教育管理史》,刘德华主编《中国教育管理史》,梅汝莉主编《中国教育管理史》,李才栋、谭佛佑等主编《教育管理制度史》,刘兆伟、刘国瑞、张良才著《中国教育管理史略》,孙培青主

①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共六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1989年;于述胜著.《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收入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共八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② 陈景磐著.《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陶愚川著.《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近代部分现代部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高奇著.《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熊明安著.《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熊明安著.《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年;余立、郑登云著.《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李华兴著.《民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霍益萍著.《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喻本伐、熊贤君著.《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田正平、商丽浩著.《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动作与教师流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曲士培著.《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董宝良著.《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 田正平、商丽浩主编.《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页。